本版编辑：海丽华 版式设计：张 慧 E-mail:z4@studytimes.cn Tel:010-68929865

唱一支歌，守一道边关

——《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》诞生记

□ 吉永峰

卡拉乔克山脚下，霍尔果斯河滚滚流过，对岸是哈萨克斯坦的草场。新疆军区阿拉马力边防连营院里矗立着一块花岗岩雕塑，像一本翻开的书，上面刻着一首歌的歌词和曲谱——“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，哪里需要到哪里去……”刻痕利落，雪落上去，风一吹就干净，字像刚刚刻好。

“阿拉马力”，是突厥语，意为“产苹果的地方”。1962年8月1日，这里没有苹果，只有野云和雪线。首任站长高立业率10名战士，牵三峰骆驼，背一口铁锅，带两把铁锹，从霍城县出发，徒步两天一夜，到了卡拉乔克山脚下。牧民拦着骆驼劝：“冬天住这里，不是冻死，就是被狼叼走。”高立业没接话，把铁锅卸在背风坡后，回了一句：“祖国的门户总得有人守。”

他们挖地窝子，木椽搭顶，覆土成丘；融雪饮马，野菜下饭，照明靠煤油灯，巡逻靠两条腿。连史馆里存着的那口铁锅，沿口磕出月牙形的缺口；骆驼鞍的毛磨得发亮，两把铁锹锈成深褐色。“三峰骆驼一口锅，两把铁锹住地窝”生动地描绘了1962年建边防站的情景，这句话被写在了连史馆的墙面上，一直留到今天。

1963年，伊犁军分区政治部宣传干事李之金到阿拉马力蹲点。李之金是四川资阳人，1937年生，1952年念初中时报名参加抗美援朝；停战后部队重新分配，他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，16岁进疆，一待就是十年。蹲点期间，他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巡逻，小本子记满战士的话：“革命战士是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”“祖国要我守边卡，石头缝中把根扎”“没有走不了的路，没有守不住的防”……

一天夜里，李之金跟班里一名青海籍战士聊天，小战士说：“哪里需要我，我就到哪里去；哪里艰苦，我就到哪里安家。”晚上他睡不着，起身拨亮煤油灯，就着微光写下：“祖国要我守边卡，边防线上把根扎，雪山顶上也要发芽。”歌名取自连部黑板报——上面有战士们用粉笔写的一行大字：“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”。他按新疆的民歌调子填了词，一首歌就这样诞生了。

歌先在班里唱，后传到哨所。那时没有广播、没有唱片，全靠口口相传。这首歌节奏明快，歌词铿锵有力，唱起来让人充满力量，而且朗朗上口，非常易学。连队开饭，有人一边吃一边哼，旁边人听两遍就会。1964年，这首歌由伊犁军分区推荐参加新疆军区演出，同年岁末进京汇报演出，获了一等奖。演出队受到周恩来总理、叶剑英元帅亲切接见。1965年，《红旗》杂志选登10首思想性、艺术性高的歌曲，它名列其中。此后，它成了阿拉马力边防连的连歌，连队被军区授予“红歌连”称号。60多年来，这首歌唱遍万里边关的每一个哨所。



边防战士冬季巡边

蹲点结束后，李之金回到了机关，歌留在了连队。后来的官兵们一代代唱着它，也一代代照着歌里的词做。几十年过去了，连队里留下几样东西：一条上山的路，后院两棵松，一盘石磨，坡上八个字，一个海拔3000米的执勤点。

原来上山的路只有一条，夏天一场暴雨，山洪冲下来，路就断了；断了修，修好了又断。新路是官兵一锹一镐挖出来的：石头用手搬，土用小推车推，手上的水泡磨成了老茧。第一批修路的人退伍了，第二批接着修，路才打通。

后院那两棵松，官兵们叫它“夫妻树”。1969年，第三任连长的妻子来队探亲，返程前从后山执勤点移来两棵松树苗栽下，临走时留下一句话：“你守边防我守家，家中有我莫牵挂。”两棵树并排站着，一棵是边关，一棵是家。

还有一位姓高的老兵，他在边防连戍边8年，复员时他把家安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团——那里离阿拉马力最近。有一年，通往连队的公路被泥石流阻断，已年过七旬的他带着老伴，翻山越岭，用小推车给连队送补给。去世前一个多月，他特意回连队看了一趟。临终前，他叮嘱老伴，每年替他回连队看一看——他这一辈子，只认一个地方：祖国最需要他的地方。

1986年，炊事班章班长回陕西老家探亲。到家第一件事，是去集贸市场，他用自己的津贴买了一盘直径约50厘米的小石磨。从汉中到伊犁，他背着石磨转了4次车；车进不了山，最后70里山路，他硬是一步步走回连队。那年，他用这盘石磨为连队做了2000斤豆腐，全连每天都能喝上热豆浆。官兵们都亲切地叫他“豆腐班长”。石磨“退役”后，被摆进了连史馆。

坡上那八个字——乐守边关、书写军魂，是2003年5月垒的。官兵们从河沟拉来20卡车石头，手抱肩扛搬上山，一块块垒成。风雪把字蚀淡了，他们就一遍遍用白漆描亮。

2004年，连队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河源地区设立了执勤点。每年连队需要抽人进驻，一次守防100天以上。有一年大雪封山，执勤点出现突发情况，需要连夜派人上去处理。满屋的战士都站起来请战，连长点了七个名字，答“到”的声音一个比一个响亮。50厘米深的积雪让人举步维艰，连长用一根背包绳把大家串起来走。战士们说，人生记忆最深处，不是在花前月下，而是为祖国戍边的日子。

李之金后来担任了伊犁军分区政委，离休后他接受采访时说：“人们记不记得词曲作者是谁并不重要，但只要歌声响起，那段历史和战士们的精神还在，就是我最大的欣慰。”

阿拉马力边防连自建连以来，受军级以上单位表彰21次，荣立集体二等功3次。今天，连史馆里那口铁锅、那副骆驼鞍、那盏马灯、两把铁锹摆成一排。新兵下连三件事沿用至今：看那口锅，学唱连歌，走一趟巡逻路。营房从土坯房换成了保温哨所，宿舍有暖气、热水；巡逻马灯换成了北斗终端。山下的霍尔果斯口岸，2025年开行中欧（中亚）班列9882列，同比增长13.2%，平均每天27列。边防环境改善了，奉献精神依然在传承。

在新时代，一批批年轻的战士来到连队，接过戍边的任务。上等兵小李是大学生士兵，老家在内地平原。刚到连队那天，弯弯绕绕的山路把他颠得晕车。冬天站哨，防寒靴20分钟就冻透，外面还得套一双厚马靴；雪后巡逻，积雪没过小腿，只能用推雪板开路。除夕夜他在山顶站哨，一抬头看见霍尔果斯口岸的万家灯火，便想起父亲的话：“咱一家不圆换万家团圆，值得。”60多年了，这首歌轮到他唱，哨所轮到他守。二十出头的年纪，唱一首比自己年龄大两倍的歌——“雪山顶上也要发芽”，这是他青春岁月里的向往。

界碑还是那块界碑，哨所还是那座哨所，唱歌的人已经换了一代又一代。当年一字一句唱它的人，大多离开了连队；今天唱它的人，散落在祖国的四面八方。这首歌从来不只是唱给守边人的——它唱的是一个去处：听党话、跟党走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

从这首歌诞生至今，已经60多年了，但它蕴含的精神始终没有过时。奋进新征程、建功新时代，依然需要“祖国要我守边卡，边防线上把根扎，雪山顶上也要发芽”的奉献精神。国门有人守，边关有人爱，青春有人续，山河有人护，复兴有人扛，这首歌的优美旋律永远在人们心头回响。

红色记忆



守住那缕茶香

□ 汪程微

我的老家是皖浙赣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，周围的山上种满茶树。村后一道岭，把流经的溪水分成了两半——岭南的水进鄱阳湖，岭北的水入新安江。“人行明镜中，鸟度屏风里”，李白笔下的光景，在这里还寻得见。水清得见底，山青得像屏风，生在这样的水土里，茶的底子就干净。翻过这道岭，便是安徽休宁——从前，岭这边和岭那边都属古徽州府，原是同一家。家乡做红茶的手艺大多从休宁学来，再往前，根在祁门。

祁门红茶创制于清朝光绪年间，皖南山里茶农改绿为红，做出了花香蜜韵的高香红茶，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。但山里的茶农并不在意这些，茶农只知道：茶青不会骗人，火候不会骗人，谁家舍得下功夫，谁家的茶就立得住。

老家有个姑婆，祖上是到祁门学过红茶手艺的，传到她手上已有了些年头。小时候看长辈做茶，她看着看着，就学会了。

每年阳春三月，茶山上茶青的香顺着一溪春水漫开，燕子在老屋梁下呢喃细语，就是在催农人们：该采茶了。唐人皇甫冉写采茶：“采茶非采菉，远远上层崖。布叶春风暖，盈筐白日斜。”春日的茶山，古往今来都是这般光景。

谷雨前后，姑婆每天清早出门采茶，到了午间就留在家中拣茶。采下的茶青摊晾在竹筛里，草木的青气弥漫在老屋中。褐色的木墙映衬着红色的年画娃娃，每到这一刻，时间似乎凝固了，厅堂里除了姑婆挑选粗老枝叶、翻动竹筛的声音，只剩下寻香而来的蜜蜂飞进飞出。细碎的阳光从天井漏进老屋，照在姑婆别着的黑色发夹上，她的双手在洒落的光线里打节拍似的上下抖落，那片片茶青，是先在她掌心里细细拣过的。采茶、拣茶、晾茶、揉茶，一道工序省不得，也改不得——上辈人怎么教，她就怎么做。手艺是什么？手艺就是旁人看不见的地方，也照着规矩来。

姑婆做的红茶，茶汤醇厚。那茶香不是单薄的一层香，是层层叠叠的：先是幽幽的兰香，接着是蜜甜，最后一下子发散开，仿佛一脚踏进百花齐放的园子。茶滑入口中，似含了一口云朵。每年谷雨的头一批茶焙出来，姑婆总要留下几包寄给她在台湾的堂妹——我们喊她小姑婆。小姑婆只要尝上一口，便能尝出来这是姐姐做的茶。

后来村里有人置了揉茶机，轰隆隆一转，半天的活计一眨眼工夫就完成了。邻舍亲戚劝姑婆也添一台，她却只笑着摇头，说机器揉出来的茶，少了手心那点热乎气：茶青得拿手一遍遍揉过去，才知道哪片嫩、哪片老，力道该轻还是该重。

她守着一口灶，一方筛：萎凋、揉捻、发酵、烘干，全靠着一双手。茶汁把指尖染黑了，揉茶时手掌被磨出厚厚的茧，她也不肯把这个活儿交给机器。固执的“笨功夫”倒是把这口纯正的味道守了下来。她最担心的就是：今天这里机器做一下，明天那里机器改一下，工序少一道，传下去的味道就薄了一层。她不愿意在自己手里，把茶叶做走了样。

做茶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。萎凋、揉捻之后，茶叶堆在竹匾里等着发酵，到了什么程度，全靠鼻子去闻。这活儿，向来都是姑公在做，每次快到时候了，姑婆喊他一声，他便凑到竹匾前，捧起一捧茶，闭上眼，做几个悠长悠长的深呼吸。间隔的工序间，夜里得起来检查好几次，直到他感觉茶的气味对了，点头说“好了”，才能进行下一步。姑公这功夫，也是几十年经验熬出来的。这门手艺，是两个人合起来才算完整：一双手管揉，一个鼻子管闻，缺了哪样，茶都不成。

只是日子不由人，姑婆走了以后，我们喝到手工茶的机会便也少了。前几年有次在表叔家，我竟闻到了久违的茶香。表叔是姑婆的儿子，如今他也继续做手工茶，用的还是姑婆留下的那口灶、那方筛和从姑婆那学来的手艺。东坡词里那句“且将新火试新茶”，在表叔这里有了最实在的意思：火是新火，茶是新茶，而做茶用的是老手艺。每到这个时候，姑公还是老样子，一个人蹲在制好的茶叶边，抓起一小把，闭上眼睛，细细地闻。半晌，他皱着眉摇头，说这一批没到位，青气没散尽；过一会儿，又抓一把闻闻，说这一批太过了，有酸味。知情的人都懂，他不是在挑毛病，他那嗅过千百回的鼻子，还在给这门手艺立着规矩。

姑公和姑婆在做茶里那点不肯偷懒的讲究，是一辈子心照不宣的默契——那不是和机器比快慢，是和自己心里那道标准较真。如今这份默契也传到了表叔手上，头两年未必样样周全，可只要这把标尺还在，茶就还能立得住。

我喝过天南海北很多红茶，逢年过节，却总会想起那个沾着茶青的竹筛。姑婆走了，可表叔手里的茶香又飘了起来。从祁门到休宁，再到那个小山村，这条路走了上百年；如今翻动竹筛的，又是新的一双手。这袅袅茶香从不是某一段时光的注脚，它是一炉火、一双手、一个鼻子、一句话，一代接一代的传承。只要有人还愿意守着这门手艺慢慢做、细细品，那杯明红透亮的茶汤就还在，那股子不急不躁、安定而温热的人间烟火味，就不会散。

自得园



男儿何不带吴钩

□ 陈 渊

“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。请君暂上凌烟阁，若个书生万户侯。”唐代诗人李贺这四句诗，清越激切，穿透岁月的风尘，至今听来仍感豪情万丈。诗中吟咏的吴钩，最初是指春秋吴越之地炉火中淬出的一种弯刀，但在漫漫岁月长河里，它渐渐脱离兵器的形制，沉淀为中国古代士人尚武精神的象征。

吴越之地，自古善铸兵器。据《吴越春秋·阖闾内传》记载，吴王阖闾既得莫邪宝剑，复下令国中工匠铸造金钩，传令曰：“能为善钩者，赏之百金。”吴地应命者甚众，其中一位铸师淬炼出一对神异的金钩，阖闾当即赐百金，将这双钩常佩于身。“吴钩”之名，即由此而来。

春秋时期吴钩的传奇故事，折射的正是中国人身佩刀剑的古老传统。远在周代，剑便不只是杀伐之器，更是士大夫身份等级的礼仪象征。《初学记》引《贾子》言，“古者，天子二十而冠，带剑。诸侯三十而冠，带剑”，印证了这一点。春秋之时，吴越既出吴钩，亦产名剑，钩与剑常并称于典籍。而剑之为物，自周秦以降便是士人风骨的标识：屈原行吟汨罗江畔，“带长铗之陆离兮，冠切云之崔嵬”，修长陆离之剑相配巍峨高冠，正是其高洁人格与不屈之志的外化；冯谖寄食孟尝君门下，郁郁不得志时便“倚柱弹其剑”而歌，那声声剑鸣，恰是寒士胸中不平之气的出口。及至秦汉，佩剑之制愈趋森严，上自天子、下及百官，无不佩剑，剑被目为“君子武备，所以卫身”，成为“士”这一阶层共有的文化印记。至于吴钩，至迟在西晋时已渐成利器之通称，左思《吴都赋》言“吴钩越棘，纯钧湛卢”，使之与欧冶名剑同席。由是钩与剑在意象上并称混用、趋于同质，同为后世文人用以托怀咏叹的兵器。

延至唐代，佩剑之风与尚武精神一同臻于极盛，“吴钩”等刀剑的意象也在唐诗中大放异彩。边塞诗人王昌龄有句“鸷鸟立寒木，丈夫佩吴钩。何当报君恩，却系单于头”，寥寥数语，写尽戍边丈夫的刚健英姿。诗仙李白更是自谓“十五好剑术，遍干诸侯”，年方二十五便“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”。他笔下的《侠客行》豪气干云：“赵客缦胡缨，吴钩霜雪明。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。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”霜刃如雪，步履如风，吴钩的凌厉与侠客的潇洒被写得淋漓尽致，这也是他本人仗剑天涯的理想追求。在李白的诗篇里，剑光始终与文采交相辉映：“抚剑夜吟啸，雄心日千里”是壮志未泯，“长剑一杯酒，男儿方寸心”是英雄襟怀。剑与诗酒相契相彰，正是盛唐男儿那种发扬蹈厉的气象。

然而，这道萦绕千年的剑光，入宋以后渐渐黯淡下来。这一转变，最先起于朝堂礼制的悄然更张。宋代推行“右文抑武”的政策，宋神宗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掌朝会仪注的礼官上奏，以为朝会宜从周礼古制，群臣当“不服剑，不脱屨舄”。至此，只有仪卫可佩带木制的“班剑”——鞘以黄质为底，饰以紫纹与金铜构件，再缀以紫丝绦带，虽形制华丽考究，但锋芒锐减。未几，礼官以为“剑者武备，服以事神，于义无取”，于是在景灵宫、太庙、南郊等大祀中的佩剑礼仪，亦被一并撤除。

宋太宗读《老子》“佳兵者，不祥之器”之语，深以为然，叹曰：“王者虽以武功克定，终须用文德致治。”在汉唐时期，臣子获许“剑履上殿”乃人臣无上的殊荣。而在宋代，理学渐兴，重理主静，士大夫的修身路径由外在的威仪转向内在的“心性”；加之科举制度臻于成熟，文人阶层逐步确立其在朝堂上的政治地位，刀剑遂不再是士人身份的必要标识。

文化剪影

与礼制转向相伴而行的，是文人群体审美趣味的迁移。宋以前，文人以“抚剑独行游”为风流，剑、酒、诗三者交织，铺展开一派张扬外放的生命意趣；入宋后，文人雅集的主流风尚，所重的是书斋园林之间的精微意趣与心性涵养。这种转变在文学意象中表现得尤为分明：李白存世诗文里，“剑”字凡百余见，处处剑光凛凛；苏轼传世词作中，“剑”“刀”却寥寥可数。这些现象映照的正是“宋文化”的内敛与含蓄。

后世咏叹吴钩的诗文虽然少了，但吴钩所承载的精神内核，却从未真正消解。那份对道义的坚守、对家国的担当，始终深植于中国人的骨血中。宋人写吴钩诗词的不多，辛弃疾即是代表，他在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中直抒胸臆，“落日楼头，断鸿声里，江南游子。把吴钩看了，栏杆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”，表达他沙场立功的雄心壮志和报国无门的愤懑之情。虽然不写吴钩，但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襟怀，何尝不是一派磅礴剑气？苏轼密州出猎，“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”，虽鬓已微霜而壮志不坠，那份豪情一如吴钩般凛冽。岳飞一阕《满江红》字字铿锵，笔底风雷更胜万千剑光，是将士胸中最锐利的锋芒。及至南宋之末，文天祥被俘后作《过零丁洋》《正气歌》，昭示了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爱国气节和浩然正气，更是以文心铸成一柄永不弯折的精神之剑。

此后佩剑之风历元明清三代几经沉浮，始终一脉未绝：每逢家国危亡之秋，这柄沉寂的剑便会再度出鞘，提振士人精神。秋瑾慨言“休言女子非英物，夜夜龙泉壁上鸣”；谭嗣同临刑高歌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”。旧邦新命之际，中国士人再一次以兵刃自况，迸发出沉郁而决绝的铮鸣。至此方知，吴钩早已远超腰间那一柄有形的兵刃。它从春秋的铸剑炉中淬火而出，行过屈原的江畔，掠过李白的酒筵，穿过唐宋的风烟，阅尽元明清的沉浮，最终沉淀为中华民族精神深处一道不灭的锋芒。男儿何不带吴钩？叩问的正是那份千百年来不曾黯淡的家国担当。